

“巴山轮会议”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

张琦

内容提要:1985年9月2日至7日的“巴山轮会议”,是在改革开放的重要时间节点召开的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讨论会。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4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仍以传统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为主,同时现代西方经济学再次传入中国,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我国的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仍是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巴山轮会议召开的大背景是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重点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直接背景是1984年底到198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势头。此外,当时经济学界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争论也构成了“巴山轮会议”召开的知识背景。参加会议的外方专家,围绕“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及“经济转轨中的相关问题”作了充分的介绍和讨论,他们对中国当时正在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和稳定经济政策表示赞赏。巴山轮会议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关于通货膨胀及宏观调控的争论仍在继续,但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范式开始悄然转换,从传统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逐步转向现代宏观经济学。贯穿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关于“保增长”与“反通胀”的争论,实质上是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关于“高速度”和“按比例”之争新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巴山轮会议 宏观调控 综合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是经济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传统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转向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吸收和运用。其二是学术研讨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接连召开的高质量经济理论研讨会,不仅影响乃至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且对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著者如1977—1978年召开的四次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1979年召开的“第二次价值规律讨论会”(即无锡会议),1984年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也包括本文要讨论的1985年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即巴山轮会议)等等。之所以说高质量,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研讨会的氛围是开放而热烈的,会议充满了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激扬气息;另一方面是因为,研讨会不乏热烈的争论,各种话题能够比较充分而深入地展开,会议的结论往往对最高决策层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因此之故,多年之后回顾改革开放历程,这些学术会议仍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并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和时间节点。本文要讨论的“巴山轮会议”就是在改革开放的重要时间节点召开的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讨论会。

[作者简介] 张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家城市群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100836。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19ZDGH014)的阶段性成果。

巴山轮会议,是指1985年9月2日至7日在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轮船上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后以“巴山轮会议”闻名。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参会的外国专家既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有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学家,前者主要有托宾(James Tobin)、凯恩克劳斯(Sir Alec Cairncross)、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琼斯(Leroy Jones);后者主要有科尔奈(János Kornai)、布鲁斯(Virlin W. Bruse)、拜特(Aleksander Bajt)等。参会的中方专家主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前者主要有安志文、薛暮桥、马洪、童大林、高尚全等,后者主要包括刘国光、赵人伟、吴敬琏(当时从社科院经济所调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不久)、周叔莲、张卓元、戴园晨等。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青年经济学者如郭树清、楼继伟、何家成等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郭树清还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楼继伟、何家成也刚刚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参加工作。

关于巴山轮会议的内容,目前最详细的资料收录在两本著作中,一本是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编的《宏观经济的管理和变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以下简称《选编》),1986年6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编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以下简称《文集》),1987年2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二者的内容大体相同,但前者收录了不少与会者的发言原文,因而更加“原汁原味”。此外,在会议之后甚至时隔多年,也有一些介绍、回忆以及研究的文章,其中尤以赵人伟于2008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第12期上的论文《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最为详细而深入。赵人伟(参会时52岁)既是“巴山轮会议”的参会者,同时也是全程见证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对“巴山轮会议”的回顾和思考,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

前辈文章珠玉在前,晚辈就同样题目再撰文不免惶恐。故而,本文拟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重新考察“巴山轮会议”的价值和意义。简言之,“巴山轮会议”不仅促进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工具的转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即从传统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综合平衡”思想转向以现代经济学为主要分析工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思想。

首先来回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一) 西方经济学的再次传入

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发展阶段来划分,改革开放初期大体可界定为1978—1984年。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仍以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为主,同时现代西方经济学开始再次传入中国,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逐步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大多数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所谓“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往往只能通过“外国经济思想史”这门课来学习。而“外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覆盖的时间范围,通常起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或上溯至更早的威廉·配第;时间下限则止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或至多延伸到约翰·M.凯恩斯之前。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新进展,当时即便在“外国经济思想史”课程中也无法学到。

改革开放后,较早向国内读者介绍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是陈岱孙、胡代光主编的一套丛书,即《现代外国经济学说知识丛书》。其中张培刚、厉以宁编著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于1980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该套丛书中较早面世的一本。以篇幅而论,这仅是一本160页的小册子。其中关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只有两章内容,分别为收入与流量均衡和需求管理(即凯恩斯主义收入决定理论的简要介绍),两章总计60页。这一时期,最为完整而全面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当属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的翻译出版。该书由高鸿业教授翻译,中译本分上中下三册陆续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其中上册于1979年11月出版,中册于1981年8月出版,下册于1982年5月出版。每次新书上市,都会引起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排队抢购。可以说,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学子起到了西方经济学启蒙甚至“扫盲”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国内编写的第一本较规范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是厉以宁和秦宛顺编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于1983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上、下两编各15章,上编15章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下编15章是对应于上编内容的数学推导。这本书有将近600页,以后来的标准看,它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介绍仍然非常简略,但在当时已是篇幅较大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

从国内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来看,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经济学课程仅在少数经济学重镇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开设(其中北京大学于1980年在全国率先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而且,当时的课程名称通常叫作“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而不是“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被教育部(当时叫国家教委)正式确立为财经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是1986—1987年的事了。^①

因此,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总体上发生转换,并未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而马上发生,而是稍晚于改革开放的实践。1983年,陈岱孙发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指出“现代西方经济作为一个整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在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镜之处。”^②以陈岱孙在中国经济学界的资历和声望,这篇文章起到了为西方经济学“正名”的作用,他的主张也代表了当时经济学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态度。同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陈岱孙的主张得到了认可。

(二)传统宏观经济研究范式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层面的经济管理一般称作“计划管理”,而微观层面的管理一般称作“经济管理体制”,计划管理的理论基础便是“综合平衡”理论。所谓综合平衡,一般是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主要包括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再加上对外经济关系的国际收支平衡。^③

关于综合平衡的概念、范围、任务、依据等等,不同学者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仍然可以概括出一些基本的共识。综合平衡,既是经济工作的方针,也是计划工作的方法。刘国光对综合平衡的定义具有代表性:“作为经济工作的方针,综合平衡就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合理布局。作为计划工作的方法就是根据上述方针原则,借助一系列平衡核算的工具,对各种人力、物力、财力的资源和需要进行对比分析,恰当安排社会劳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比例,以满足社会生产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各种需要。”^④从这一宽泛的定义可以看出,综合平衡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按比例”。合理安排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农、轻、重的比例等等,都属于综合平衡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关于综合平衡有两次大规模讨论,也形成了两次研究热潮。第一次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致对应于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⑤第二次集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大致对应于1979—1981年的调整时期。^⑥两次研究热潮都发生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这并非巧合。无论是60年代初的调整,还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调整,其直接原因都是此前指标定得过高、摊子铺得太大,片面追求高速度而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片面追求“高速度”受挫,于是回过头来强调“按比例”即综合平衡,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反应。

① 方福前:《引进西方经济学40年》,《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2期。

② 陈岱孙:《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③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173页。

④ 刘国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重要问题(代序)》,刘国光主编:《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⑤ 董志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济调整的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⑥ 萧冬连:《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65—66页。

1981年1月6日至14日,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辽宁省计委经济研究所联合发起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在沈阳召开。许涤新在讨论会上致开幕词,他说:“我国三十年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综合平衡搞得比较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就比较快;反之,什么时候忽视综合平衡,比例失调,国民经济就难以发展,甚至还要倒退下去。离开综合平衡,就谈不到高速度。这是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条定律。”^①许涤新的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对综合平衡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关系的共识。现在看来,这一判断平淡无奇,似乎是常识。但得到这一认识其实并不容易。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关于综合平衡的讨论中,上述思想一度被批评为“消极平衡”,即“采取消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指标看齐。”与消极平衡相关的当然是“积极平衡”,也就是所谓“在高速度中求平衡”。与之相对,强调综合平衡的观点则主张“在平衡中求高速度”。^②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综合平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董辅初的思考较为深入。他明确提出不能以破坏平衡为代价去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原因在于,经济增长速度是生产力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各生产力要素之间的比例协调,各生产力因素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从而推动经济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这里所说的生产力诸因素之间的配比的协调,也就是我们说的平衡,而各种生产力因素的配比的协调,最后都会表现为资源同需求的平衡。”^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董辅初对“综合平衡为什么很难保持”这一历史现象进行的分析,已触及到深层次的机制问题。按照传统的看法,只要不要把指标定得过高、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大,似乎就实现了综合平衡。然而董辅初论证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在面临不确定性因素时很难灵活调整,而且计划是在信息不准确、不充分、不及时的情况下制定的,因而同样无法及时作出调整。也就是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很难实现综合平衡。因此就有必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反馈作用”,即“价格在调节经济的平衡发展中将起重要的作用。”^④此外,董辅初还较早地认识到综合平衡与经济结构之间关系:“如果经济结构是不合理的,失调的,那么,这种种方面的平衡就很难长期保持。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经济上的严重不平衡,归根到底都同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分不开”。^⑤这些观点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综合平衡之于计划经济,就如同宏观调控之于市场经济。姑不论实践中综合平衡是否做得足够好,综合平衡理论都是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主流宏观经济理论。^⑥

改革开放初期,宏观经济学这一概念仍不时受到批评。正如戴园晨评论说:社会主义要不要有“宏观经济学”?在传统苏联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有人认为,微观经济、宏观经济之类的名词,是西方经济学家使用的,因而宏观经济学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对此只能进行批判,不能使用宏观经济学之类的名词。^⑦以回顾的眼光来看,这种说法当然是荒唐的,但它并未随着改革开放的施行而马上消失,而是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改革开放的推进而逐步退却。

① 许涤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开幕词》,《经济研究》1981年第2期。

② 《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634—641页。

③ 董辅初:《国民经济平衡的几个问题》,刘国光主编:《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④ 董辅初:《国民经济平衡的几个问题》,刘国光主编:《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第32—39页。

⑤ 董辅初:《国民经济平衡的几个问题》,刘国光主编:《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第40页。

⑥ 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以下两篇文献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梳理。林光彬、拓志超:《中国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2期;林光彬、拓志超:《中国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基于学术史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报》2019年第3期。

⑦ 戴园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二、“巴山轮会议”的背景

(一)“巴山轮会议”的现实背景

赵人伟对“巴山轮会议”召开的背景进行了准确地概括。大背景是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改革的重点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① 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实际上就是转移到企业改革。所以《决定》中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扩大企业自主权”。^② 自主权当然包括企业对产品的定价权,这就要求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工资制度等进行配套改革。改革特别是价格体系改革的前提是,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因而《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这一提法突破了以往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③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实质是放权即“微观搞活”,而“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也就需要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以便能够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减少行政手段的运用。^④ 这就是《决定》的基本逻辑。

赵人伟指出,“巴山轮会议”的小背景或直接背景,是1984年底到198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势头。^⑤ 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4年全年GDP同比增长15.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2.7%;1985年全年GDP同比增长13.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9.3%。1984年,我国货币发行量比1983年增加了49.5%;其中10—12月货币发行量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46%!^⑥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经济过热,与1979—1980年的第一次过热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区别。共同之处在于,二者背后都有对企业“放权让利”的影子;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要是由计划体制下投资扩张导致的,而后者不仅包括投资扩张即信贷基金膨胀这一传统因素,还包括消费扩张即消费基金膨胀。而且,1984—1985年经济过热的通货膨胀也比上一次严重。当时,刘国光、赵人伟在向“巴山轮会议”提交的书面发言中也提到了这种“双膨胀”的现象:1984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1.8%,银行在工资、奖金等方面的现金支出比上年增长22.3%。^⑦ 薛暮桥回忆起1984—1985年的经济过热时,提到了导致“双膨胀”的制度因素。1984年下半年,银行系统决定赋予专业银行更大的贷款自主权,设想1985年银行贷款数额的浮动,以1984年的实际贷款数额为基数;同样,劳动部门决定赋予企业更大的工资分配自主权,设想1985年各企业工资总额的浮动,以1984年实际工资总额为基数。这样的机制设计,自然就导致各银行竞相放贷,甚至送款上门,而企业也猛涨工资、滥发奖金,为的是把基数做大,来年获得更大的上浮额度。^⑧

1985年初,中央层面已经意识到要对经济过热进行治理。1月4日,国务院召集会议讨论宏观经济形势和对策,会议认为通货膨胀不利于发展和改革,主张加强宏观调控,实行紧缩政策稳定经济,并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⑨ 3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宏观管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的增长。2—10月,国务院先后四次召开全国省长、直辖市

① 赵人伟:《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4—56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6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72页。

⑤ 赵人伟:《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⑥ 彭森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⑦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

⑧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2—403页。

⑨ 彭森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第220页。

市长和自治区主席会议,以统一认识,部署抑制经济过热的措施。^①

(二)“巴山轮会议”的知识背景

除上述两方面经济现实的背景之外,当时经济学界的看法和争论也构成了“巴山轮会议”召开的知识背景。这主要是指关于通货膨胀问题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概括而言:一方认为在改革进程中,适度的通货膨胀利大于弊,甚至是经济起飞阶段所必须的;另一方则认为,不能对通货膨胀置之不理,除因其固有的弊端需要治理之外,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也不利于营造推进改革所需的良好经济环境。双方都同意1984—1985年出现了通货膨胀,但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是否应采取紧缩政策来应对、应如何治理通货膨胀、是否可以搞“政策性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发展与改革等等,则存在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这些争论落在政策上,核心是要不要采取紧缩性政策来抑制过热。

主张采取紧缩性政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吴敬琏。1985年上半年,吴敬琏明确主张在改革开始阶段采取适当紧缩的政策,抑制经济过热,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吴敬琏的基本逻辑是,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必须营造一个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买方市场,也就是所谓“宽松的经济环境”。但在改革之初,我国在一定时期内将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也就是说,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常态。既然短期内总供给上不去,就必须有意识地控制总需求,使其不至于过度膨胀。^②应当说,防止总需求过度膨胀、采取紧缩性政策抑制经济过热,在当时是比较主流的观点。薛暮桥在回顾1979年以来的稳定和调整物价问题也表示,为稳定物价,“根本办法是控制积累基金(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防止过度膨胀”,同样主张控制总需求。^③刘国光于1985年2月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会议上的发言,表达了与吴敬琏类似的观点,同样认为当时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货币过多,原因是“由于投资加消费形成的总需求,超过国民生产总值提供的总供给”,这“对于当前的调整和改革都是不利的”,因为“改革……更需要一个比较宽裕的经济环境”。而且他还敏锐地指出,虽然遏制消费膨胀是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投资膨胀可能是更重要的问题。^④从后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这一判断是非常有远见的。

而当时一些青年经济学者却反对采取紧缩性政策压制总需求,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起飞阶段的典型特征,这种观点被称为“起飞论”。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还摆下“擂台”,邀请吴敬琏和“起飞派”领军人物、八十年代人称“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对擂辩论。^⑤1986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生王松奇发表《试论我国社会总需求的宏观控制与调节》一文,认为“那种所谓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社会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的说法……恐怕只能作为一个良好的主观愿望,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很难成为客观现实。”该文的基本逻辑是,首先承认1984年底以来经济中存在总需求过高,也应当对过高的总需求进行抑制;但是,简单地采取控制信贷、抽紧银根的办法并不足以控制总需求。控制总需求不能只关注总量,还必须考虑需求结构,其关键在于控制基建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需求。并且,控制总需求、降低通货膨胀不是宏观控制的唯一目标,同时也要保持相当的经济增长速度。^⑥1987年,王松奇更加明确地提出,“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长期经济调节还是应当把经济的快速成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也就是说,“当物价稳定的目标同经济增长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当前者服从后者”。理由有二:其一,由总需求扩张导致的通货膨胀并非一无是处,通货膨胀除了“促退”之外还有“促进”作用;其二,通货膨胀固然有害,但治理通胀的紧缩政策

① 董辅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② 吴敬琏:《再论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

③ 薛暮桥:《一九七九年以来稳定和调整物价问题》,《经济研究》1985年第6期。

④ 刘国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应有良好的经济环境》,《管理世界》1985年第3期。

⑤ 彭森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第220页。

⑥ 王松奇:《试论我国社会总需求的宏观控制与调节》,《经济纵横》1986年第4期。

可能更加有害,必须权衡二者的利弊。^①也就是说,通货膨胀是我国经济起飞的必要代价,这正是当时流行的“起飞论”。

“起飞论”的理论来源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即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提出者。罗斯托的学说,国内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对其进行评介。但他的理论开始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是在80年代初。1983年8月,罗斯托应邀在北京外贸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身之一)发表学术演讲。在演讲中,罗斯托使用了三个概念来展开分析:S型增长曲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第五次上升阶段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他的基本逻辑是:当时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S型曲线的“经济加速发展阶段”,同时也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第五次上升阶段和以硅晶片、光纤、基因技术和机器人等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这三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预计将带来整个世界80、90年代的高速增长。他还判断,中国正处于“向技术成熟推进”的阶段,也就是经济高速增长“起飞”阶段。^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上升阶段的特点是能源、食品、原料的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的上涨,这实际上意味着通货膨胀。罗斯托还指出,三种因素将带来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一些不适当的政策”如通过高利率和高失业来控制通货膨胀,就会使经济增长减缓。^③现在我们知道,根据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而失业率上升就意味着经济增速的下降。罗斯托反对以高失业率为代价来控制通货膨胀,也就是反对以削弱经济增长为代价来反通胀,这与当时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起飞派”的主张是一致的;尽管不能说后者简单照搬了罗斯托的观点,但受到罗斯托的影响是显然的。

罗斯托来华演讲之后的1984年,厉以宁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评述罗斯托的学说,较全面地评介了他的“主导部门分析法”和“起飞学说”。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特征是“总体批判、局部肯定”,写作风格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如评论罗斯托的学说“抹煞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关系”“不区分剥削者收入和劳动者收入”“理论体系是庸俗的、反科学的”等等。但在总体否定的基础上,又肯定他提出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用性。这两篇评述文章也成为当时青年经济学者了解罗斯托学说的重要渠道。^④

1984年,世界银行派出以林重庚(Edwin R. Lim)为团长的经济考察团,再次对中国进行考察(第一次考察是在1980年)。第二次考察后,考察团推出了题为《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的考察报告,包括一个主报告和六个附件。世界银行的这份考察报告对决策层和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考察报告提出,中国要实现1981—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00美元上升到800美元,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尚未确定。中国要在2050年赶上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必须至少以5.5%—6.5%的速度保持经济增长。考察报告给出了中国1981—2000年经济发展的三种预测方案:翻两番方案、中速方案和平衡方案。三种方案,预计国民收入年均增速分别为6.6%、5.4%、6.6%,人均国民收入增速分别为5.5%、4.3%、5.5%。按报告测算,翻两番方案和中速方案,都需要国内积累率达到29%,后者之所以增速较低,是因为投资效率较低。平衡方案与翻两番方案增速相当,但只需26%的积累率,主要靠消费来弥补投资的不足,并发展服务业来降低资金需求。报告还提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可能高于预测值,因为投资占比可能更高。^⑤事实表明,后来

① 王松奇:《促进还是促退:通货膨胀功能及对策的再思考》,《金融研究》1987年第11期。

②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北京外贸学院的演讲(摘要)》,《国际贸易问题》1984年第1期;刘景竹:《罗斯托谈世界经济及其前景》,《世界经济》1983年第12期。

③ 刘景竹:《罗斯托谈世界经济及其前景》,《世界经济》1983年第12期。

④ 厉以宁:《罗斯托起飞学说的评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厉以宁:《罗斯托“主导部门分析法”的评论》,《经济科学》1984年第6期。

⑤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2、52—54页。

中国的经济增速,比这份报告预测的要高得多,1978—201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9.5%。^①

当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除世界银行的模型之外,中方专家也运用自己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了预测。中方的预测同样给出三种方案:协调发展方案、重型结构方案、高速发展方案。三种方案预计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7%、7.2%、8.9%,所需的积累率分别为29%、32%、35%。世界银行建议采取平衡方案,中方课题组推荐协调发展方案,两个方案的思路是一致的,都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使人民得到较多的实惠。中方的模型略微调整一下参数,结果与世界银行的预测基本相同。^②

中方专家的经济预测,是当时一个重大研究项目“2000年的中国”的一部分。该项目的动议可追溯到1981年,1983年被列为“六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和批示。该项目由国家计委、经委、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技术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组成研究领导小组,聚集了30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其事,可谓阵容强大。至1986年,该项目已完成《2000年中国的经济》《2000年中国的人口与就业》《2000年中国的能源》等12个分报告,以及2000年中国的卫生、体育、通信、文化、海洋等20多个专题研究报告。^③

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经济学家构建的宏观经济模型,已经开始使用数学规划、投入产出分析、计量经济学、控制论、系统论等方法。这一时期的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一方面因其较少涉及意识形态因素,另一方面也符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定计划、做规划”的习惯,加之杂糅了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这些80年代的“显学”,因而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法而取得了较快的进展。

起飞论、世界银行的第二次考察报告以及当时兴起的宏观经济预测,也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知识资源。

三、“巴山轮会议”的主要内容

时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林重庚是“巴山轮会议”的重要联络人,他本人也参加了巴山轮会议。据林重庚回忆,1985年初,国家体改委的领导找到他,建议由世界银行出面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几方面的内容:(1)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2)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3)整合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经验。因此在选择外国专家时,世界银行也严格按这三个主题有针对性地发出邀请。所请外国专家既有托宾、科尔奈、凯恩克劳斯这样理论功底深厚的经济学家,也有阿尔伯特·埃明格勒等从事实际工作的经济官员。^④当然,即便是托宾等人也并非“学院派”经济学家,他们对现实经济问题同样非常熟悉。

前已述及,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巴山轮会议”的内容都得到了很好的记录、总结和回顾。特别是《选编》和《文集》,既收录了外国专家的发言提纲和部分中方专家的书面发言,同时也收录了会后中方参会学者撰写的总报告和专题报告。“巴山轮会议”之后,除媒体报道外,一些参会的中方学者也撰写了关于会议内容的介绍和综述文章。这些文章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面向现实需求,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色彩,文章的重心放在会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内容上;与此相关但有所区别的另一个特点是,将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放在前面,“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则放在后面。如刘国光等人的评述文章分三大部分,前两部分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关于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第三部分才是“关于宏观经济管理”;从篇幅来看也是前两部分占一半,第三部分

①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版。

② 李金昌、吕薇:《我国专家和世界银行专家座谈讨论中国的长期发展问题》,《经济学动态》1985年第7期。

③ 李泊溪、李金昌:《关于“2000年的中国”之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6年第7期。

④ 林重庚、苏国利、吴素萍:《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占一半。^①与此类似,赵人伟、何家成的文章共分八个部分,前四部分是会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后四部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篇幅也是大约各占一半。^②这两篇文章后来也收录在《文集》当中。周叔莲的文章则将重心完全放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上,关于“宏观控制”的内容仅放在“中国经济从传统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过程”下进行简要介绍。周叔莲的解释是:“巴山轮会议的主题是宏观经济管理问题,但是在改革中加强和改进宏观经济管理是不能不研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因此会议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了认真的探讨。”^③作为外方代表,林重庚的文章则主要总结会议关于如何运用“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仅在文章最后才简要介绍了外国专家关于经济改革的建议。^④

同为参会人员,中外专家在介绍和总结会议内容时的这种微妙差异,反映出双方关注点的不同。中方专家之所以更关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固然是基于现实的需要,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看来,体制改革问题才是“重大理论问题”,而“宏观经济管理”不过是“管理经验”(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已。似乎前者是“道”,后者只是“术”。当时参会的中方经济学家或许没有注意的是,“巴山轮会议”上外国专家介绍的宏观经济管理并非只是“经验”,其背后是整个现代宏观经济学。时隔二十三年,赵人伟在回顾巴山轮会议的内容时,虽然仍将改革目标和体制转换放在前面,但篇幅已大为压缩,将重心放在了宏观经济管理(间接调控)及其实施条件上。^⑤

本文关注的是“巴山轮会议”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范式转换方面的意义和作用,因此将重点评述会议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从外国专家的发言提纲或发言记录来看,筹办会议时提到的三个主题中的后两个,很大程度上是交织在一起的,讨论的都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可以归并为同一个主题。以下基于原始会议记录,按归并后的两大主题,对会议的内容进行归纳和评述。

(一) 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

针对这一主题邀请的三位外国专家是美国的托宾、英国的凯恩克劳斯和德国的埃明格尔。詹姆斯·托宾 1947 年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1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凯恩斯学派重要经济学家之一,时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阿莱克·凯恩克劳斯 1936 年于获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科学院院士,曾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院长、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等职位,并曾担任英国政府经济事务部部长。奥特玛·埃明格尔曾任联邦德国中央银行副行长、行长,OECD 国际收支平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从会上的发言提纲和发言记录来看,围绕“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这一话题发言的是托宾和埃明格尔,而凯恩克劳斯则讲述的是二战后英国如何从战时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因此以下首先评述托宾和埃明格尔的发言,凯恩克劳斯的发言放在第二个主题下讨论。

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最熟悉的应该是托宾。据张卓元回忆说,巴山轮会议上,托宾仅凭一张中国统计数字表,就能从主要经济指标看出中国经济运行处于过热状态,“这让我们在座的中国人都非常讶异。”^⑥托宾在会上的发言提纲并不长,总篇幅约一万字左右,但理论性很强,题目是《略论非集中型经济的宏观控制》。内容大体可归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宏观经济理论的介绍,二是宏观经

① 刘国光等:《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评述》,《经济研究》1985年第12期。

② 赵人伟、何家成:《加强宏观控制、推进经济改革(上)——记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经济学动态》1985年第11期;赵人伟、何家成:《加强宏观控制、推进经济改革(下)——记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经济学动态》1985年第12期。

③ 周叔莲:《从巴山轮会议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86年第1期。

④ 林重庚:《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与外国学者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科技导报》1986年第1期。

⑤ 赵人伟:《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⑥ 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0页。

济政策发挥作用的制度条件,三是对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①以下分别述之。

宏观经济管理本质上是需求管理,需求管理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都属于间接控制手段。财政政策既包括通过改变政府支出直接影响总需求,也包括通过税收、转移支付(《选编》中译作“划拨”)和补贴影响消费进而间接影响总需求。货币政策则通过改变流动性、信贷规模和利率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支出,进而间接影响总需求。宏观经济控制的目标是: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物价稳定和对外贸易平衡,而第一个目标的实现并不能保证后两个目标也能实现。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并不能防止经济波动;但从二战结束后西方各国的经验来看,宏观经济政策确实缓解了经济周期、避免了极端不稳定状态的出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与总需求相比,总供给难以集中控制,因此政府很难运用宏观政策应对供给冲击。与短期经济波动取决于需求侧不同,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供给侧。但是,针对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的确会影响长期增长。一方面,经济陷入衰退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总产出,若不用需求管理政策应对,则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企业创新皆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长期增长。另一方面,从总量上看,刺激消费或刺激投资皆可提振需求;但从结构上看,需求管理政策着力点不同,会导致消费和积累的比例不同,而积累的多少关系到长期增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可以产生不同的宏观经济效果。若采取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组合,可以降低利率,进而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投资。从以上所述可见,这实际上是托宾对凯恩斯式需求管理政策的概括。

托宾介绍的第二个方面是宏观经济政策所需的制度条件。一是要有一个政府债券市场,使政府能够通过发行债券来为财政赤字融资,而不必依赖于多发货币(印钞票)。通过买卖债券的方式调节经济中的货币量,可以实现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的目标。二是要有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使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货币量来影响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总需求。需要说明的是,托宾关于政府债券市场的观点,《选编》和《文集》都将其归入“货币政策”,其实它也有财政政策的含义:可以在避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施赤字财政政策。

托宾讲的第三个方面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建议。首先是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空间要比发达国家更大,所以应当更加注重供给管理;而需求管理的作用,应限于防止需求波动导致的不稳定及对经济增长的损害。而且,运用凯恩斯式需求管理政策解决非自愿失业,这种办法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或者至少是不充分的。因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靠需求管理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人的就业。供给受到生产能力的限制,若闲置资源都已充分利用,此时采取扩大总需求政策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不难看出,作为凯恩斯学派的重量级经济学家,托宾其实并不主张通过刺激需求的方式来“促增长”,需求管理政策主要用于防止过热,而不是用来刺激经济。其次是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从对长期增长的促进来看,真正起作用的是投资而非消费。提高投资的办法有多种,可以通过公共部门投资,也可以通过企业进行投资。中国若采取对国有企业“放权”的办法来激活微观主体的决策权,就要更多地依靠利率这一工具来间接影响投资。社会主义国家运用定量配给或价格管制来压低消费,造成强制储蓄并增加投资,这是直接控制投资的办法。然而提高微观经济效率要求逐步废除配给制,所以政府必须更多地依赖间接手段。不过,若经济已处于“紧绷”状态即已经位于潜在总产出水平,要提高投资就必须减少消费,否则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再次是关于货币政策的问题。托宾指出,货币量并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尤其不适合作为长期政策指标。一方面货币流通速度并不稳定,易受到金融技术、公众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货币量取决于“现金-存款比”以及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即取决于公众和商业

^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149—158页。

银行的行为。因此中央银行对货币量的控制只是一种间接控制。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总量更加不适合作为总需求管理的指标。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与货币流通量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且缺乏西方国家那种可以使中央银行影响货币总量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对中国来说,更加切实可行的办法是直接控制利率和信贷规模。最后,托宾对中国的宏观政策目标给出建议。“对社会主义不发达国家来说,我大胆建议,宏观政策的中心应放在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上,或储蓄和投资的平衡上。”^①

埃明格尔发言的题目是《通过货币政策实行宏观经济控制》,介绍了宏观经济学中货币政策的基本内容以及货币政策在市场经济体中的运用。^②其发言提纲共有七个部分,也可归为三方面。

其一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和中介目标。联邦德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控制通货膨胀。相比之下,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最终目标更广泛:控制通货膨胀、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前提之一,是要有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可以顶住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在发达经济体当中,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最强的。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需要通过中介目标来间接实现。而货币供给量就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可见,这一观点与托宾不同,托宾是凯恩斯主义者,而埃明格尔的观点更接近货币主义,因此他明确表示要把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那么,怎样定义货币量?这就涉及到不同的统计口径,如 M_1 、 M_2 和 M_3 。其中 M_1 是指流通中的现金加活期存款, M_2 和 M_3 则是更广的定义。选择最恰当的货币量的主要标准是:“选择在若干年里同总货币需求(即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最稳定的货币额。”^③虽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选择,但通常来说 M_1 是个较窄的指标,它和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总货币需求)的关系并不稳定,德国和美国的经验都表明了这一点。从各国实践来看,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 M_1 、 M_2 和 M_3 与名义总产出的关系,并不局限于某一口径的货币量,是更加务实的做法。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按照货币主义思想制定货币目标的是德国和日本。德国从 1974 年开始选择“中央银行货币量”(类似于 M_3)作为中介目标,每年按照一定的幅度增加货币供给量。日本从 1975 年开始,选择一个大于 M_2 的指标作为货币供给量的中介目标,货币供给量按一定的速度每年递增。

其二是货币政策工具。选定货币量作中介目标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用哪些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在绝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并不向企业直接发放贷款,而是通过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来间接控制货币量。其次,中央银行的政策工具通常有公开市场操作(买卖公债)、再贴现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需要说明的是,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埃明格尔讲的这些内容现在看来已属常识,但在当时却并非如此。中国人民银行仅在两年前的 1983 年才被确立为中央银行,四大专业银行之一的中国工商银行也仅在前一年的 1984 年成立。而且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民银行仍然缺乏作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清晰的政策目标。从 1985 年起很长一段时期,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都是信贷规模而非货币量;直到 1998 年,中国人民银行才正式放弃信贷指标,转而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④埃明格尔还表示,各国金融制度体系不同,因此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也不尽相同。而且,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量的变化,和这些变化对产出和价格产生影响之间会有一个时滞,即货币政策存在滞后性。

其三是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金融体系主要包括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两大部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构成了银行系统。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干预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商业银行通过放贷创造经济中的货币,因此货币政策要发挥作用,就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商业银行系统。埃明格尔表

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 157 页。

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 133—148 页。

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 135 页。

④ 陈雨露、郭庆旺主编:《新中国财政金融制度变迁事件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0—104 页。

示,问题的关键不是银行归私人所有还是归国家所有,关键是它们能否在自由市场体制中发挥作用,在竞争的基础上从事贷款业务,它们的具体业务必须不受政府干预等等。^① 在多数发达国家,银行系统又可分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二者分业经营。美国自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来,就实行分业经营。不过,近年来混业经营的趋势再次出现(原译文为“开始朝综合型银行的方向发展”)。^② 除银行之外,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也是十分重要的。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和个人融资;资本市场则通过出售债券和股票为企业、政府和其他机构融资。不同的国家,资本市场的情况也不同。美国和英国的股票市场非常发达,而德国的股票市场规模却小得多。不过德国的债券市场却很发达,包括政府债券和某些国有部门(如铁路和邮政)的债券。德国工业部门的资金需求主要通过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来满足,而英、美企业在更大程度上则依靠资本市场。埃明格尔这里讲的,其实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通过银行融资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和以英、美为代表的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的差别。无论是银行系统还是资本市场,都必须对其进行监管。各国的监管体制不尽相同,监管主体也各不相同。对银行业的监管,有的国家中央银行本身就是监管者(如英国),有的国家有专门的“银行监督局”(如德国)。从埃明格尔的发言提纲中可以看出,但他本人并未言明的一点是:金融监管必须以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为依据,而不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进行。

(二)经济转轨中的相关问题

据林重庚的回忆,针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相关问题”及“整合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经验”两个主题,邀请参会的外国专家有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法国前计划委员会委员米歇尔·阿尔伯特、南斯拉夫联邦经济稳定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拜特、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里罗尔·琼斯。^③ 另外,凯恩克劳斯的发言也可归入这一主题。

前面说过,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大家更为关注的问题。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或许感到奇怪,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既然已经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且不论1984年之前学界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就有各种争论,^④事实上,即便在《决定》出台之后争论也并未消失。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强调“商品经济”,这种争论虽有起伏或改头换面,但却贯穿整个80年代。如肖灼基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本质上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一理论概括中,商品经济才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⑤这是强调商品经济。而陶增骥则表示:“我以为《决定》是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具有二重性,它既有商品经济的一面,又有计划经济的一面,两者是对立的统一;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⑥这是强调计划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董玉昇做了较好的综述(尽管对某些文献存在误读),此不赘述。^⑦ 本文想强调的是,只有理解了当时的背景,才能理解中方专家在“巴山轮会议”上以及会后,对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为何如此看重。

关于这一问题,会上最重要的发言来自科尔奈。科尔奈的发言提纲是所有参会者当中最长的,

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140页。

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141页。

③ 林重庚、苏国利、吴素萍:《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④ 陈意华:《一九八四年前理论界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讨论概况》,《中国经济问题》1985年第1期。

⑤ 肖灼基:《当前商品经济需要着重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⑥ 陶增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宏观控制》,《财政研究》1985年第5期。

⑦ 董玉昇:《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85—198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4页。

篇幅约有3万多字,发言题目是《提供给中国改革者的匈牙利的一些经验教训》。^①如题目所示,科尔奈在发言中回顾和评价了匈牙利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改革历程,并将一些理论概括嵌入其中。科尔奈的发言和讨论中,引起中方专家最大兴趣的是他对“四种调节方式”的概括。科尔奈首先把协调机制分为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两类。所谓行政协调,是指信息在一个“中心”和各个企业之间双向流动;所谓市场协调,是指信息在企业之间双向流动。而行政协调又分为两种:直接的行政协调(IA模式)和间接的行政协调(IB模式),前者是指“中心”给企业直接下达命令,后者是指“中心”不直接给企业下命令,而是通过手中掌握的一套杠杆,对企业的行为进行调节。而市场协调又可分为无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IIA模式)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IIB模式)。^②

需要说明的是,科尔奈的发言提纲中并未明确划分IIA模式和IIB模式,这种划分应当是在会议讨论中形成的。完全无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即IIA模式,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改革的目标模式只能在IB和IIB中进行选择。“科尔奈教授认为,真正有效的改革应当进入IIB模式。……他建议,中国的改革一定要始终坚持不懈,即使暂时需要经过IB的模式,也千万不能忘记IIB这个真正的目标。”^③

对这一问题稍加讨论是有意义的。“巴山轮会议”后,最早发表的两篇综述文献是刘国光等撰写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评述》和赵人伟、何家成撰写的《加强宏观控制、推进经济改革——记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④两篇文章都提到了科尔奈提出的四种协调模式,但刘国光等认为“我们不能轻率地把IIB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⑤而赵人伟、何家成的文章虽然通篇采取“述而不作”的写作风格,实际上赞同IIB模式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时隔二十三年后,赵人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指出中国的改革尚未实现当年提出的IIB目标模式。^⑥刘国光等不赞成IIB模式的理由是,它忽视了所有制结构和计划指导、收入分配等问题,无法区别社会主义国家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和资本主义国家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这一质疑合理之处在于,科尔奈提出的IIB模式确实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不合理之处在于,在现代经济学当中,宏观控制或宏观调控本身就与所有制无关,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无论是指令性还是指导性)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且宏观控制也与收入分配、共同富裕等问题无关,二者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从最高决策层的共识来看,所有制问题取得重大突破,要等到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从这一意义上讲,与刘国光等的文章相比,赵人伟、何家成的认识具有超前的眼光。“巴山轮会议”上,与会者接受了科尔奈关于四种协调模式的划分,原则上同意IIB模式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⑦

科尔奈提出,匈牙利的改革是从IA模式走到了IB模式,因此并不彻底,还存在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被政府任命的国企领导对上级而非对市场负责等问题。此外,科尔奈在会上提出的许多论断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例如,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企业放弃直接的行政控制,所以应该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权与政府对企业的放权结合起来。^⑧改革不是一个

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61—94页。

② 刘国光等:《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评述》,《经济研究》1985年第12期;赵人伟、何家成:《加强宏观控制、推进经济改革(上)——记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经济学动态》1985年第11期。

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16—17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⑤ 刘国光等:《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评述》,《经济研究》1985年第12期。

⑥ 赵人伟:《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⑦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16页。

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75页。

纯粹的经济问题,而且还触及一些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如收入的分配、财富的所有权和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权力分配。^① 改革过程中的重要风险之一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具有自我增强的特点,如果得不到控制,可能会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②

凯恩克劳斯发言的篇幅仅次于科尔奈,约有2万多字,发言题目是《战后英国从硬控制经济到软控制经济的过渡》。凯恩克劳斯表示,战争时期(指二战期间)的英国经济,采用了某些类似于计划经济下的控制形式,包括价格管制、实物控制等措施,以确保打赢战争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战后向福利国家的转变,一是从实物控制转向财政控制,二是从供应控制转向总需求管理。在此过程中,包括商品价格、利率和汇率在内的价格机制开始重新发挥作用。战时的控制是由短缺引起的,控制是暂时的,在长期中不应持续存在。不过,“如果想在可能出现的体制改革与战后英国向福利国家过渡中的变化之间划等号的话,那将是一个错误。”^③但从英国的经历当中吸取某些有普遍性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有几个方面:其一,控制的办法可以用来对付短缺,但其弊端在于无法发挥价格信号的激励作用来克服短缺。因此控制的办法应当是权宜之计,而不应作为永久的工具。其二,控制的使用,取决于政府是否有更重要的目标,如国防或战争;其三,控制取决于政府的目标。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充分就业,那么无须进行直接控制,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能实现目标。充分就业的目标,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其四,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英国长期保持控制的方面主要有对投资的控制(通过金融途径或直接途径)、对外贸和汇率的控制、对劳动力的控制、对产业布局的控制以及对财政的控制。但对劳动力的控制从未取得成功。战后英国对经济进行控制的两个基本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和恢复对外贸易平衡。

阿尔伯特以《关于法国的计划体制》为题,介绍了二战后法国实施计划体制的经验。他特别强调法国的计划化“不是从任何特定的理论中引申出来的,而是面对严峻的形势应运而生的。”^④关于法国的计划体制有两个基本结论:其一,实施计划体制是促进法国战后近40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二,法国计划体制的效率来自增强而不是削弱市场因素。需要说明的是,阿尔伯特所说的法国计划体制,与传统的集权式计划经济完全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就是“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当会上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伯特说法国经济就属于IIB体制时,科尔奈本人对此没有表示异议。”^⑤

阿尔伯特在发言中还提到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其一,法国计划委员会总部只是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研究中心,而不是国家行政机构;他们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以采用的工作方法去施加影响。所以法国计划委员会“从来没有支持过政府管制物价政策”。其二,法国的经验表明,基于财政补贴形式的产业政策,往往是失败的。其三,宏观经济预测对经济发展大有裨益。法国统计研究所和计划委员会联合制订的宏观经济预测准确率非常高,1962年到1985年的经济预测,除失业一项外,其他方面完全符合事实。^⑥

布鲁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中国应建立资本市场,二是所有制应当多样化;三是宏观控制应当用收入政策来控制消费基金,并控制对外经济活动。

拜特在发言中回顾了南斯拉夫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南斯拉夫的市场化改革始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属于“市场社会主义”时期。这一时期有过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同时出现了收入

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83—84页。

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86—87页。

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104页。

④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126页。

⑤ 刘国光等:《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评述》,《经济研究》1985年第12期。

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第129页。

差距扩大和失业的上升。随后进入了“契约经济”时期,企业与各级政府机构通过契约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代替了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管理。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造成了一些严重的负面后果,高失业率和恶性通货膨胀并存,同时外债负担日益沉重,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0%。拜特认为,这些后果并非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而是由于缺乏对经济的宏观控制。需要说明的是,南斯拉夫出现的经济问题并非仅由经济方面导致,作为一个联邦制的共和国,联邦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外部环境等等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它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拜特无法料到的是,“巴山轮会议”七年之后的1992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就彻底解体了。

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

参加“巴山轮会议”的外方专家,无论来自西方还是东欧,对中国当时正在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和稳定经济政策都表示了赞赏。^①会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撰写了《关于“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主要情况报告》,并报送国务院。^②对于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围绕通货膨胀的争论,“巴山轮会议”起到了从理论上廓清问题的重要作用,外方专家“对中国宏观经济所作的分析也坚定了中国政府实施稳定经济政策的信念”。^③

1985年是“六五计划”的最后一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七五’期间要求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是: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左右。”^④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七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定在百分之七左右,这是政治局常委一致同意的,执行中可能超过。百分之七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⑤

1985年采取的一系列宏观控制措施,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到1986年显示出效果。1986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为8.1%,比1985年下降4.7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速为9.6%,比1985年下降8.6个百分点;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为6.0%,比1985年下降2.8个百分点。总的来看,经济过热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控制。然而,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开局之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平均增长4.4%,其中二月份仅增长0.9%,这与“七五计划”提出的年均增长7%左右的目标有很大差距。“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出现‘滑坡’,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这些对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措施的力度有很大影响。”^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界关于通货膨胀及宏观调控的争论仍在继续。在争论当中,一种学术上的变化悄然发生,这便是宏观经济研究范式的转换:从传统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逐步转向现代宏观经济学。

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宋国青、张维迎发表在1986年第6期《经济研究》上的《关于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该文提出,1985年抑制总需求的宏观控制措施,到当年年底时已经导致货币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而有些人认为银根抽而不紧,国民经济仍处于低热状态。

①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410页。

② 张卓元:《1985年“巴山轮”会议引入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与经验》,张卓元、张晓晶主编:《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1页。

③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第40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801页。

⑤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⑥ 董辅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第303页。

而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观察形势所依据的理论分歧。文章首先将矛头指向“国民收入超分配”这一概念。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经常使用此概念的是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据薛暮桥本人说,他在1956年就使用这一概念,1980年和1986年又多次使用这种分析方法,这是他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下研究通货膨胀时使用的一种方法。^①顺便说一句,有人在回顾当时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时,说“新生代经济学人把这个现象在概念上创造性地定义为‘国民收入的超分配’”。^②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一概念不是当时才“创造性地定义”的,而是早已有之,定义它的人也不是“新生代经济学人”而是薛暮桥;相反,宋国青、张维迎等“新生代经济学人”恰恰反对这一概念。他们在文中提出,主张“超分配”的人认为,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之和大于国民收入就意味着超分配,而实际上又把居民收入等同于消费基金,这样一来,如果居民货币收入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快于国民收入增长率,就出现了“国民收入超分配”。但是,居民收入不等于消费基金,收入除用于消费外,还有储蓄这一途径。通过1978—1985年的数据来看,居民边际储蓄倾向高于平均储蓄倾向,意味着储蓄增长率高于收入增长率,也就意味着消费增长率低于收入增长率。按这样的逻辑,既然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增速慢于收入增速),那就只能依靠增加投资来弥补,如果采取压缩投资的政策,投资需求就可能无法充分吸收不断增加的储蓄,进而导致总需求不足。^③这正是宋国青、张维迎认为1985年的全面紧缩政策导致需求不足的重要理由之一。应当说,他们的上述观点是半对半错。对的方面是,“国民收入超分配”确实不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概念,而属于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将收入等同于消费的确不严谨。错的方面是结论,压缩投资未必导致投资需求必然下降到不足以吸收储蓄的地步,按照最简单的两部门经济模型,只要投资大于储蓄,总需求就是大于总供给的。也就是说,储蓄的存在,并不是“不应压缩投资”的充分条件。这篇论文的特点在于使用了边际储蓄倾向、平均储蓄倾向等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这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进步。此外,该文还使用了工资刚性、价格刚性等显然属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以后来的眼光看,这篇文章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例如在分析总需求时,时而使用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时而使用凯恩斯的框架,存在逻辑上的混乱。但是,这篇论文毕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首次运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新作,具有学术范式转换的标志性意义。

1987年7月4日,《经济研究》编辑部召开座谈会,讨论的主题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参会人员除董辅弼、赵人伟之外,皆属于“新生代经济学人”,如宋国青、张维迎、张学军、杨仲伟、马建堂、陈东琪等。张维迎在会上发言,再次表达了基本理论存在分歧的观点:“经济理论讨论难以深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之间缺乏共同语言。讨论同一个问题,没有共同的坐标系,各说一套。使用同一个词,各自赋予不同的含义。大家都在谈总供给、总需求,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是望文生义的。……没有共同的规范,没有共同的理论基础,没有共同的思维方式,……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就只能在低水平上重复。”^④杨仲伟在发言中主张,为了适应改革的需要,应当构造新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经济主体的行为假定和心理假定、宏观经济的组织结构特征、总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周期分析等等。^⑤陈昭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研究,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受到两次大的冲击,一次是西方经济学的引进,一次是科尔奈《短缺经济学》的引进。这对于我们改进分析方法和研究工具非常重要,但也造成了新的问题,即“不同理论

①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415页。

② 张军:《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4—115页。

③ 宋国青、张维迎:《关于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86年第6期。

④ 张维迎:《总量分析、结构分析和预算软硬》,《经济研究》1987年第8期。

⑤ 杨仲伟:《谈谈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8期。

体系中的概念相互借用,使概念本身的含义出现极大混乱。”^①

这些观点表明,改革开放后受到西方经济学训练的“新生代经济学人”,对传统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以及东欧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是否仍然适用于解释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开始质疑和不满,呼吁宏观经济研究范式的转换。

1987年,薛暮桥以“楚探”的笔名发表《国民收入“超分配”和通货膨胀》一文,对国民收入超分配这一概念进行了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质疑的一种回应。^② 该文提出,在实物层面,超分配不可能发生,但在货币层面,超分配是可能的,其货币表现就是通货膨胀。从薛暮桥的解释可以看出,国民收入超分配就是通货膨胀,尽管这一概念不符合现代宏观经济学。薛暮桥论证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超过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消费基金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这样使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引起货币形态的国民收入‘超分配’。”^③ 这一论证,既使用传统范式下“积累与消费”的概念,又用到了西方经济学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虽然不难理解作者想表达的意思,但确实存在批评者所说的“没有共同语言”“使用同一个词,各自赋予不同含义”的问题。

同样在1987年,楼继伟发表《论总需求、总供给、国民收入超分配》一文,对国民收入超分配这一概念及其适用性提出质疑。文章认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并不等价于国民收入超分配。国民收入超分配,是指国民收入使用额大于国民收入生产额。国民收入生产额只是一种事后统计,并且要求净进口和外资流入之和为零,不同于反映潜在总产出的总供给。同样,国民收入使用额也是事后统计量,不同于反映事前货币供给量的总需求。以“避免国民收入超分配”即追求国民收入使用额和生产额的平衡作为总量政策的核心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平衡完全可以在低于总供给的水平出现,体现的是生产多少就使用多少的思想,而不是最多能生产多少就安排相应水平的使用。追求这样的平衡,只能陷入一种实物分配的决策过程。文章还通过定量分析表明,超分配发生时不一定出现超需求,而超需求发生时一般都会发生超分配。作者主张以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而不是“避免国民收入超分配”作为总量政策的目标。^④ 1990年,郭树清也撰文对一些宏观总量概念进行批评,包括消费基金、结余购买力以及国民收入超分配。文章对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各种含义进行了剖析,对这一概念持否定态度。^⑤ 进入90年代后,国民收入超分配这一概念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基本消失了。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仍在继续,另一方面,针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大量增加。与宏观经济相关的研究主题和内容包括: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和手段,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货币供给与金融体制改革,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治理,对外贸易和外贸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很多都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并且,随着“新生代经济学人”的成长,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也愈加明显。正如于光远在1990年所说:“年轻的经济学工作者,……他们之间的差异与他们和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之间的差异相比要小,即他们之间有一些与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不很相同的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的理论准备、他们接受的理论观点,以及他们的知识结构与老一辈有显著的不同。”^⑥

除大量面向现实的对策研究论文之外,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也出现了一些尝试运用现代宏观经济学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专著。主要有符钢战、史正富、金重仁合著《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

① 陈昭:《对宏观经济研究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的几点意见》,《经济研究》1987年第8期。

②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415页。

③ 楚探:《国民收入“超分配”和通货膨胀》,《经济纵横》1987年第9期。

④ 楼继伟:《论总需求、总供给、国民收入超分配——兼论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之间的关系》,《经济研究》1987年第10期。

⑤ 郭树清:《关于若干宏观总量概念的界定问题》,《财贸经济》1990年第8期。

⑥ 于广远:《序》,《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85—1989)》,第7页。

析》(学林出版社 1986 年版),张风波著《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樊纲、张曙光等著《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0 年版)等。其中,《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代表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高水平。

这本书不是“政策研究”型著作,并未对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是否应当治理通货膨胀、治理到什么程度、是否存在需求不足等围绕现实问题的争论给出答案,而是试图对公有制之下的宏观经济现象给出理论上的解释。正如作者所说:“理论的任务不是承认特殊的事实,而是给特殊事实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①充分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是本书的最大特色,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博弈论,宏观经济学中的消费理论、投资理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经济增长理论等等,全都被作者拿来解释公有制宏观经济的种种现象。这些经济学理论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有些还是相当陌生的。在此没有必要对这本 40 万字的著作进行全面介绍,仅简要梳理该书对“短缺常态”和“过热常态”的解释。论证的出发点是,公有制经济下的微观主体即个人具有“收入幻觉”的特点: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关心储蓄或积累,积累是“中央计划者”的事,个人并不关心。而作为中央计划者,必须保持一定的积累率,进而保证未来的经济增长。因此,个人总喜欢高消费(不论多高,个人都觉得太低)与中央计划者总要保持一定的积累率(不论多低,个人都觉得太高)之间形成了一对矛盾:消费与积累的矛盾。对中央计划者来说,为了保持一定的积累率,就必须压缩消费,但这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为了满足民众高消费的要求,就必须压缩投资,但这就降低了积累率。解决这一矛盾“皆大欢喜”的办法,通常是增发货币、增加名义收入,这就意味着总需求的膨胀。“无论总供给水平或实际国民收入规模的大小如何,在公有制条件下,……总需求总是具有大于总供给的趋势。”^②这就是“短缺常态”。以上对总需求的分析,是在假定总供给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总供给增加即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消除短缺常态呢?从静态的角度看是可以的,“但是从动态的角度看,无论总供给规模如何,也无论总供给的增长速度如何,都不会妨碍总需求以比总供给增长速度更快的速度扩大”^③,这就是“过热常态”。应当说,这一理论框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微观主体的行为假设推演出整个宏观经济后果,完全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研究,基本完成了从传统范式向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转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告别了“短缺经济”,开始面对需求不足的局面。

五、结束语

1985 年的“巴山轮会议”,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国际讨论会。外方专家在会上的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和政策建议,不仅产生了决策影响力,而且更具有学术影响力。后来有媒体报道说,“巴山轮会议”的最大功绩是在中国传播了宏观经济学说。^④会议召开前后,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展开了争论。在争论当中,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范式也在悄然发生迭代,逐步从原先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转变为现代宏观经济学范式。随着西方经济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再次进入高校经济学课堂,至 80 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接受西方经济学训练的青年经济学者,已经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巴山轮会议”也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新旧范式转换的分水岭。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并未随着经济学范式的转换而消失,此后亦曾多次出现。贯穿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关于“保增长”与“反通胀”的争

① 樊纲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0 年版,第 143 页。

② 樊纲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第 394 页。

③ 樊纲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第 394 页。

④ 彭森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第 218 页。

论,实质上是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关于“高速度”和“按比例”争论新的表现形式。樊纲、张曙光等早在30年前提出的“过热常态”,直到目前也不能说完全消失。

The Bashan Boat Conference in 1985 and the Change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Research Paradigm

Zhang Qi

Abstract: The Bashan Boat Conference held between September 2nd to 7th in 1985 had been a far-reaching academic conference at a vital momen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1978 - 1984, China's economic research was still dominated by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Soviet political economy. Meanwhile the modern economics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once again, and began to occupy a space in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economics. China's mainstream macroeconomics in this period remained the theory of overall balance corresponding to the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y system. The background of the Bashan Boat Conference was th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dopted a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the Party's twelfth central committee in 1984. After that the focus of the reform would shift from rural areas to cities. The immediate cause for the Bashan Boat Conference was that China's economy had been overheating since the end of 1984. In addition, debate on inflation among economists also proved to be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framework for the Bashan Boat Conferenc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nference from foreign countries have discussed how the state should control the economy and the issues in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y all advocated the stabilization policies curbing inflation employed by China's government. After the Bashan Boat Conference, the problems of inflation and macroeconomic control were still in dispute among economists, while China's macroeconomic research paradigm was changing gradually from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Soviet political economy to modern macroeconomics. The argument about whether keeping economic growth or controlling inflation all through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in effect a new form of the debate on strong economic growth or proportionat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y period.

Key Words: Macroeconomics, Bashan Boat Conferenc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Overall Balance

(责任编辑:马烈)